新观察

# 重建学术回应当代思想难题的能力

□陈培浩

学术研究究竟是居于经院之中，为知识传承和义理考辩而努力；还是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参与时代文化建构，这构成了中国学术的两种重要传统。汉代以降就有所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它们各有追求、可能和限度。但是，我们仍要说，从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设角度，以学术积极回应现实难题的实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黄怒波的《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是一部特色鲜明、努力与当代精神难题对话，并出示了自身独特思想方案的学术著作。本书从哲学脉络和思想视野切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超越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化思路，呈现出极强地介入当代思想难题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问题意识。

> “学术越来越严谨、自足，其反面却是越来越烦琐和不及物。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的鸿沟已经悄然形成。文学能否对现实发言？文学如何对现实发言？边缘是文学本来的位置，还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藩篱化的结果？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如何重新加入对当代社会和精神难题的诊断和发言中？这些问题纠缠着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

## 当代诗歌：抵抗虚无主义，参与现代性文化建构

不同于当代诗歌研究一般的研究范式，《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的研究思路是从当代思想史进入，其诉求之一在于“成为当代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它关心的，不仅是中国当代诗的历史进程，更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诗艺的救赎功能”。正如尼采所言：现代社会将面临虚无主义这个最可怕的客人长久的叩门。这里的虚无主义不是日常所说的个体生活失去目标的虚无，而是哲学上关于现代性危机的严肃诊断。海德格尔则认为，虚无产生于一种普遍厌烦的时刻，一种差别消失的时刻。或者说，虚无主义产生于现代人对存在的遗忘之中。事实上，不管是弑神还是忘在，都是现代性的内在症候。詹尼·瓦蒂莫的《现代性的终结：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将现代性界定为克服的时代：现代性呈现为一个快速过时、不断更替并永无休止的过程。现代性成了自身走向终结的根源，真理被转化为价值，唯一的真理被转换为无限的诠释。事实上，关于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精彩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卡林内斯库并没有将虚无列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但审美上的颓废正是哲学上虚无主义的表现。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并非一律是消极的，还有具有肯定性的积极虚无主义。诊断虚无和反抗虚无是尼采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体两面。在黄怒波看来，虚无主义同样是纠缠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幽灵，“尼采以后该轮到我们面对虚无主义、抵抗虚无主义了”。

无疑，虚无主义既是西方现代性问题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萦绕当代中国的幽灵。中国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以颓废的面目出现，也以解构主义、日常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等不同的面目出现。当它戴上以上面具时，上半场扮演着肯定性角色，下半场却可能被虚无主义附体。换言之，在不断重演的PASS权威的行动中，在旧的“神圣”被亵渎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更高价值”，等不及新的关系确立，一切就又烟消云散了。不管是市场、生活还是技术，不管是微博、微信、抖音还是元宇宙，假如没有对更高价值的渴望，“以新反旧”不过是将人们推入虚无主义的加速轨道中。

但是，黄怒波却相信，中国当代诗，至少是当代诗的杰出部分，一直置身于反抗虚无主义的行动中，并因此与中国当代社会同行，并为未来提供了重要启示。作者指出：虚无主义从五四之初就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诗歌在阐释存在、追问命运、启蒙及自我批判等文化实践中，“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同盟’，又是文化精神的阐释者”，并在“寻找一条回到精神世界的通道”。中国当代诗，既吸纳虚无主义的文化资源，又有力地抵抗了虚无主义。黄怒波认为：80年代诗歌“参与启蒙，召唤‘人’的回归，确保了民族复兴、现代化任务”；90年代诗歌“回到文本本体，从线性的历史观中摆脱出来，更深入地得到文本深处的美学反应”；新世纪诗歌的“审美精神具有了历史性、时代性及国际性，彰显着指向未来人类走向的美学精神”。中国当代诗歌“一方面表现着虚无主义的存在，一方面又以‘相信未来’和‘开花’的态度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从而以批判现代性的方式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建构。沿着尼采“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危机，黄怒波以为“与上帝和解”的新浪漫主义之路，实是中国当代诗歌正在实践，又启示于中国当代思想之处。

不难发现，黄怒波无意写一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而更希望彰显出中国当代诗歌在对虚无主义的吸纳和抵抗中，如何参与中国当代思想和精神建设，并为当代中国创造出一种有价值、有重量的精神语言。

## 挣脱范式桎梏，让学术回应时代的思想难题

与一般在当代诗内部谈论当代诗的学术理路不同，此书除了引述了大量哲学、思想史著作及当代诗歌文本外，还引述了诸如《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著）等当代中国社会、财经方面的材料，显示了在大时代语境和思想史脉络中探讨当代诗歌的鲜明问题意识。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在探索学术研究与社会问题研究的融合方面颇具现实性和启发性。

思想史的进路研究有价值、有难度，对当代诗歌研究也具有崭新的开拓性。事实上，从哲学和思想角度研究虚无主义的多，从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角度研究虚无主义的却很少。贺照田从80年代的“潘晓来信”讨论中国当代社会虚无主义的历史根源，表现出对中国当代社会虚无主义思想的强烈兴趣；黄平《反讽者说》一书，选取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纪的韩寒为主要分析对象，他透视“反讽”实为了反思“虚无”。然而“虚无主义”只是此书的问题意识，并非直接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不论是贺照田还是黄平的研究，都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内部介入当代社会及思想问题的渴望。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复杂转型，知识分子既有转身下海的，更多从“广场”回到“岗位”，探索着更学术的知识可能，此间状况，一个著名概括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在学术化、“历史化”进程中既拓展了新的可能性，也逐渐陷入疏离于社会现实的危机和陷阱。

学术越来越严谨、自足，其反面却是越来越繁琐和不及物。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的鸿沟已经悄然形成。作品普遍沉溺于自我的小世界，研究的问题意识缺乏现实感，而来自于陈陈相因的学术谱系。其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圈子化；另一方面则是出圈的焦虑。曾经在当代社会中万人瞩目的文学，变得对现实无能为力。文学能否对现实发言？文学如何对现实发言？边缘是文学本来的位置，还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藩篱化的结果？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如何重新加入对当代社会和精神难题的诊断和发言中？这些问题纠缠着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思想史进路的学术研究在新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浮现，正显示了当代学术界内部对以上焦虑的反应。

事实上，当代诗歌本应是历史、社会、时代以至人类精神世界变化最敏感的探测器。诗人在时代与社会之间扮演着观察者、见证者、阐释者、抒情者和瞭望者的角色。然而，现代性内在的虚无主义症候形诸于外，体现为急剧的裂变效应。这使得任何一个文化方案，刚刚还是革命、先锋和建设性的，迅速就变成腐朽、过时、压抑性的力量。语境的转换如此快速，无论是当代诗中的“朦胧诗”“大文化诗”“纯诗”“圣诗”“口语诗”，最初都具有解放性，却又迅速成了遮蔽性因素。强调反崇高、反英雄的日常主义最初是建构性的，但马上就遁入无效解构之境。40多年来的当代诗歌研究也复如此，每一种理论范式的生成都包含着其问题指向，但又携带着自身的意义限度。强调诗的本体研究，无疑是要捍卫和挽留诗在市场化、鄙俗化时代的精神光晕，但一不小心就变成对炸裂现实无动于衷的研究。裂变的现代性何以催生虚无主义？最重要在于，虚无主义的实质乃是思维的能动性被裂变的现实所抛弃。因此，抵抗虚无主义要求我们在一往无前的现实中保持对更高价值的向往，在唯变为常的境遇中保持一种自反性姿态，努力挣脱时代不断生成的固化思维桎梏。某种意义上，《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一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顽强地挣脱了原有研究范式的桎梏，使当代性的精魂再次来到中国当代思想的危机与建构面前，体现了让学术回应时代思想难题的努力和探索。

■关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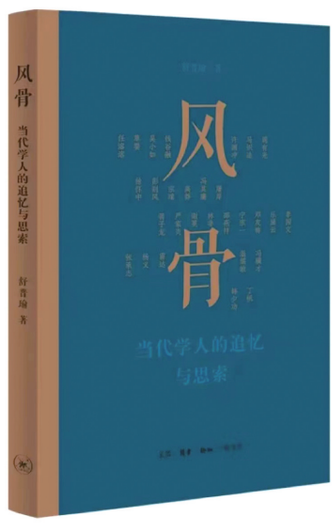
# 缝隙永远是宽阔的

## ——读《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

□丁晓平

舒晋瑜是一名作家型记者，也是一名记者型作家。我无法知道自1999年供职《中华读书报》以来，舒晋瑜到底采访了多少位作家、写了多少篇文章，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就是她的每一次采访写作，对她来说都应该是一次挑战，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她采访或对话的对象大都是文坛名家，这就需要她不仅熟悉这些人的作品，还要熟悉他们的人生、治学、成才历程，并且把大量的阅读、理解提炼成逻辑清晰、缜密、新鲜的话题，从而真实、扎实又生动活泼地立体展示一个个人物的心路历程、精神风貌和人文情怀，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收获文学、艺术、生命之外的人生真谛。《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6月版）通过对周有光、钱谷融、许渊冲、吴小如、草婴、任溶溶、冯其庸、高莽等近30位当代学人的文心探访，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别样的人文风景。

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是一座富矿。20多年来，舒晋瑜始终活跃在文学现场，不知疲倦地挖掘、开进，体现了她的综合素养、敏锐眼光、宏阔视野和扎实文风。有作家形容她是文学的“战地记者”，这是恰如其分的。舒晋瑜的探访是独立的，也是开放的，更是负责任的，其所反映的文学追求和价值取向，正如书名《风骨》一样，既堂堂正正又独树一帜。阅读《风骨》，就像闲庭信步于一座文学的家园，舒晋瑜用她朴素、诚实、简洁的语言为我们描摹了一张张文学家的面孔，或慈祥、或谦逊、或潇洒、或冷峻、或超逸、或狂狷……字里行间镌刻着一代学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烙印，凸显的是他们纯粹的精神品格、严谨的学术态度、不懈的创作追求和特别的人格风范。由此，也可以说，《风骨》既是一部当代学人的精神史，也是一部文学家的心灵史。




舒晋瑜是勇于挖掘、善于挖掘的。与这些前辈面对面进行关于文学、学术、历史和人生的对话，其本身就是一种对知识和智慧的挑战。舒晋瑜通过自己积极、真诚、主动、深层且极具亲和力的探访，使得她与采访对象之间的沟通没有停留在语言和文字上，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比较精准地抓住了要害。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用心、用情、用力的探访中，舒晋瑜体验到了当代学人智慧的感召力，有的甚至成为忘年交。舒晋瑜以其扎实、严谨、求实和过硬的素质赢得了前辈学人们的信任，从而使其写下的访谈录自出机杼，没有成为时间的易碎品，而是品格高尚、品位高雅的佳作，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风骨”时说：“是以怡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於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在舒晋瑜的《风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遇事不怒、顺乎自然、宏观意识”的“新潮老头”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还看到了“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的百岁作家马识途；不仅认识了“治学和做人首先必须真诚”的“文学赤子”文艺理论家钱谷融，还认识了“做学问首先是做人”的北大教授吴小如；不仅理解了“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把自己比喻成小草的翻译家草婴，还理解了“我生下来应该是干这一行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还有立志要把“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不到绝顶永远不停”的翻译家许渊冲。在《真实严谨做学问》中，我们从冯其庸艰难坎坷的“红学”研究之路中懂得了“不有艰难，何来圣僧”的深刻和广博；在《实现梦想花了60年》中，我们从高莽翻译和绘画的人生旅途中看到了坚韧不拔和乐观向上；在《中国文化精神的探寻须根植大地》中，我们从被誉为学界“成吉思汗”或“徐霞客”的杨义那里，看到了积累多门专家之学的精神榜样；在《一个时代的文学“雷达”》中，我们看到了真诚坦率、掷地有声，愿意“用心修饰自己，仔细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见”的评论家雷达。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读来令人感动，更令人振奋。

《风骨》是一部致敬之作。在舒晋瑜的笔下，我们不仅深层次了解了当代学人的作品，更透彻地理解了他们的人品，凸显的是风骨，力透纸背的是精神力量。比如，“来世还是诗人”的屠岸，“他的话听起来那么平静温和，却似黄河涌入大海，让人感受到历经大风大浪却显出波澜不惊的宽厚与深邃”；再比如，“即使像蚂蚁爬，也要写下去”的宗璞，一生追求“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强调文学“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还有奉行“精神至上，仁爱为先”的宁宗一，快人快语又单纯爽直，认为“任何谈及心灵的写作都带着强烈的回忆与反思色彩，它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读’，因为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叙事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自己”，要在反思人生中给历史留份底稿。一辈子致力于鲁迅研究的林非，坚持“做学问要讲学术良心”，一直强调鲁迅研究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呼吁“鲁迅仍然是科学和文学启蒙主义的旗帜”。在舒晋瑜看来，谦和、严谨、不苟言笑的严家炎，看上去哪一项也和“大侠”沾不上边儿，但心里却有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大侠世界，追求的是“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

“历尽沧桑而愈见深邃，洞悉世事而愈见旷达。”能与这么多前辈先生面对面地谈话，舒晋瑜说，这既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陪伴，是一种幸福的陪伴，让她体会到什么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诚如她自己所言：“他们的通透、豁达、谦逊、包容却潜移默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和他们相处的短暂时光里，聆听他们所经历的风雨人生，试着体会他们的生命感悟，我觉得自己也渐渐变得充实丰盈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幸福的探访中，舒晋瑜是清醒的，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她说：“我无意爆料，无意以我有限的敏锐挖掘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素材，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是一个晚辈、一个聆听者，分享他们曾经或辉煌或曲折的人生经历。我珍惜并怀恋陪伴老人的时光，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记录，让读者对这些学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对他们鲜明的个性和学术经历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对文学艺术而言，缝隙永远是宽阔的，只有能力的问题。”舒晋瑜就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缝隙”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观察家的康庄大道。有人说：“巨匠在限制中创造。”为了把采访做得比别人更深一点、更新一点、更扎实一点、更体贴一点，在每次采访之前，舒晋瑜都努力做好“功课”，尽可能多的阅读采访对象的作品和相关资料，做大量的笔记。功夫在诗外。在实际采访中，她绝对不是一个被动的听众，她随时把自己的疑惑或意见提出来，现场求解，与老人们在思想上进行互动，采访变得轻松愉悦又兴致盎然，被访者妙语连珠，访问者如醉如痴。这样的探访，自然令人茅塞顿开又让人超凡脱俗，激情四溢又美妙无穷。她清楚采访对象们永恒的价值所在，更清楚作为一个文化记者所承担的责任和良知。

■新作快评 杨小凡中篇小说《在希望的田野上》，《长城》2022年第4期

# 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成功实践

□徐玉松

文学是时代的镜像，也是历史的见证。新时代脱贫攻坚持续时间长，空间分布广，影响程度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讲好脱贫攻坚故事，塑造脱贫攻坚典型形象，这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杨小凡一如既往保持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姿态，秉持勘探生活的敏锐眼光，其所创作的中篇小说《在希望的田野上》采取亡灵视角，再现夏雨扶贫期间实事求是的作风、敢做敢当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能力，从而讲过了齐家寺率先脱贫出列的真实故事。文本视角独特，情感充沛，正视政策实施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再现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尊重现实又超越现实，成功塑造了可亲可敬的扶贫干部形象，高度浓缩脱贫攻坚的艰苦历程和伟大成就，是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新收获。

《在希望的田野上》刻画了一个“有争议”的扶贫干部。夏雨从省城到药城齐家寺挂职三年有余，在一次招商引资的饭局上，陪同前来投资的周乐天董事长少量饮酒，之后长眠不醒。作为酒后牺牲的扶贫干部，功焉？罪焉？死亡之后，恰是众声喧哗之时。地方连夜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夏雨死亡的性质问题。知夏雨者，为其请功；罪夏雨者，亦无法否认夏雨为齐家寺奋斗以至牺牲的客观事实。夏雨亡灵的回忆，让读者得以了解夏雨牺牲的真正原因。“夏雨是为齐家寺付出了生命，不树为英雄典型村民不答应”。

在“写什么”几成定规的主题创作范式下，“怎么写”变成更为重要的问题，杨小凡需要精心设置“谁来叙述”“怎样叙述”。亡灵视角是特殊形式的上帝视角，又兼具第一人称叙事的温度和贴切，这一精巧的叙事方式，又可以摆脱现实生活逻辑的规约，自由装置不同时空的事件。《在希望的田野上》实现了叙事自由，文本以会场为中心，以夏雨亡灵为视角，铺展开三年多来的扶贫事迹。基于此，小说结构近于剧本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场景高度集中，矛盾尖锐对立，故事集束呈现，构建了可以称之为“项链式”的叙事模型。文本共分十节，各节相对独立又环环紧扣，每个故事相对完整，所有故事均由夏雨在齐家寺扶贫工作所贯穿，由此形成烘云托月的效果。在故事的选取和组合上，杨小凡巧妙避开类似作品主题先行、政策叙事的窠臼，凸显扶贫的地方性、民间性，他把民间故事、地域文化、传说史志与扶贫故事融为一体，穿插孔子传说、药城饮酒风俗等于其中，使得文本故事愈加丰赡，可读性、艺术性显著增强。

现实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往往以个人写群体，以地方写中国。夏雨是千千万万中国脱贫攻坚干部的代表，齐家寺扶贫故事显然是中国扶贫故事的地方版。在皖北扶贫战场上，夏雨可能有原型，但夏雨毕竟是作家“杂取种种人”合成“这一个”的结果。他经过作家在现实基础上的提炼、概括和迁移，其形象更加集中、突出、饱满，更能代表千千万万抛妻别雏上山下乡的扶贫干部。杨小凡首次涉足脱贫攻坚主题创作，他的可贵之处，是在歌颂这一战略决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始终正视历史进程中的事实和矛盾，不回避扶贫领域曾经出现的问题。体制的高度统一与齐家寺家族权力之争，崇高与卑微、正义与邪恶的对抗，填表式扶贫、假贫困户，扶贫领域的微腐败等等，在小说中都有反映。文本由此产生极强的内在张力。随着扶贫的深入开展，扶贫体制机制日益完善，村民政治觉悟、道德水准迅速提升，扶贫领域的各种问题令人信服地被一一妥善解决，齐家寺最终通过验收，率先出列，胜利脱贫。齐家寺脱贫故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中国大地，其象征意味呼之欲出。

《在希望的田野上》由生活现实走向艺术真实，集中概括了脱贫攻坚战略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和共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崇高精神。杨小凡的雄心于是实现。他所刻画的扶贫干部如此血肉丰满，令人印象深刻。夏雨“在希望的田野上”挥洒汗水，播种一己的情感和生命，获得齐家村百姓的爱戴、拥护。他是无数脱贫攻坚干部的生动写照，是众多为这一战略奉献生命的扶贫干部的缩影。夏雨最终埋葬于平原，那里却隆起一座丰碑，镌刻着和平年代可歌可泣的扶贫史诗。

夏雨“走了”，其遗志继承者业已到位。歌声继续飘扬在齐家寺的田野上空，召唤着更多的有志之士为之接续奋斗，“为她富裕，为她兴旺……”